

“爱比米修斯隐喻”：威廉·吉布森小说中的数字记忆术和主体性危机

“The Epimetheus Metaphor”: Digital Mnemonics and the Crisis of Subjectivity in William Gibson’s Novels

帅仪豪（Shuai Yihao）

内容摘要: 古希腊的爱比米修斯神话作为揭示人与技术“相互发明”的隐喻，在赛博空间时代迎来新变体，即基于各种数字化“代具”的数字记忆术在赋能人类记忆实践的同时，也可能消解人类的主体性。威廉·吉布森将这一技术哲学难题融入科幻小说创作，在赛博美学和数字记忆术困境的激荡中探讨“情感操控”“文化植入”等数字记忆术消解人类主体性的路径，探索人类反抗失败和反抗成功的不同情境及其原因，叩问依赖数字记忆术的当代文化症候。不过度依赖数字记忆术、接受记忆的流逝并坚持个体的差异性乃赛博空间时代记忆实践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 爱比米修斯隐喻；威廉·吉布森；数字记忆术；主体性危机

作者简介: 帅仪豪，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英美科幻小说、西方文论等。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当代英美科幻小说中的赛博空间前沿问题研究”【项目批号：23FWWB017】和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数字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研究”【项目批号：2024 自研－外语 08】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Epimetheus Metaphor”: Digital Mnemonics and the Crisis of Subjectivity in William Gibson’s Novels

Abstract: The ancient Greek myth of Epimetheus, as a metaphor for revealing the “mutual invention” of humans and technology, has ushered in a new variant in the cyberspace era—digital mnemonics, based on various digital “prosthetic,” which not only empower human memory practices but also have the potential to dissolve human subjectivity. William Gibson incorporates this dilemma i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nto his science fiction writing. At the intersection of cyber aesthetics and the dilemma of digital mnemonics, Gibson explores the ways in which digital mnemonics dissolve human subjectivity, including “emotional manipulation” and

“cultural implantation”; examines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reasons for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human resistance; and questions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symptoms of relying on digital mnemonics. This study argues that not relying excessively on digital mnemonics, embracing the transience of memory, and uphold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re essential principles for memory practices in the cyberspace era.

Keywords: The Epimetheus metaphor; William Gibson; digital mnemonics; the crisis of subjectivity

Author: **Shuai Yihao** is Associate Researcher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207, China). His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contemporary British and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Email: John_kexto@outlook.com).

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Protagoras*”)中记叙了这样一则神话故事。传说中宙斯命令爱比米修斯为所有生物分配特性，他慷慨但盲动地将各种生存上的优势特性分配给各种动物，如奔跑速度、飞行禀赋、潜水技能等，以至于轮到人类时，已没有特性可供分配，进而导致人类失去了基本的生存能力。爱比米修斯的兄弟普罗米修斯不忍看到人类的遭遇，遂盗取天火赠与之，使他们能够利用火种等外部工具和技术来生存和发展。贝尔纳·斯蒂格勒 (Bernard Stiegler) 在《技术与时间 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1994) 中援引这一故事，表达了技术与人类起源之间的关系。在斯蒂格勒看来，这则故事就像描摹人类原始困境的某种隐喻，揭示了人类与生俱来的脆弱，以及技术对人类的不可或缺。简而言之，在后种系生成观上，人与技术“相互发明” (张一兵 65)，人“存在于自身之外” (斯蒂格勒, 《过失》 210)。

然而，爱比米修斯隐喻除揭示技术对人类的积极作用之外，也预言了技术对人类的控制。神话中，宙斯为报复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的行为，施计使潘多拉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为人间带去了无尽苦难。火种和潘多拉魔盒可谓一体两面，当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有赖于技术时，技术便变相凌驾于人类之上，人类反而在主客颠倒中跌入了由技术主导的囹圄。正如聂珍钊所言，当代科技对人类生活的主导，“已经不是我们出于伦理的思考选择接受与选择拒绝的问题，而是接受即生存、拒绝则淘汰的问题” (37)。当下社会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不得不与时俱进利用人工智能处理各种问题，却可能因此丧失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

在所有例子中，记忆可能是最隐晦且复杂的例子。相较而言，技术在提升人类的问题解决能力时所伴生的负面效应是不言自明的，但技术在提升记忆能力时伴生的负面效应却往往不易觉察。当失去先天记忆禀赋的人类，凭借赛博空间和数字化工具更迭了记忆存储的方式、扩大了记忆存储的容量，是

否也会如希腊神话中以蜡为翅的伊卡洛斯一样，因太过靠近太阳而融化翅膀、陷入危机？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本文首先将从斯蒂格勒和阿斯曼等学者的记忆理论出发，烛照数字记忆术在赛博空间时代的表征、意义与困境，然后将围绕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科幻小说，在相关理论话语与赛博叙事的交互中，探讨吉布森对“代具”在赛博空间时代引发的数字记忆术变革以及可能招致的主体性危机之哲思。

一、“代具”、数字记忆术和主体性危机

记忆作为研究对象可以有诸多面向，比如作为艺术的记忆、情感的记忆、技术的记忆等。¹其中，作为技术的记忆（即我们常说的记忆力）早在古希腊时期便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兴趣，他们甚至为其开辟了名为“记忆术”（mnemonic）的学科，流传下了诸多传奇故事。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诗人西蒙尼德斯（Simonides）的故事。传说西蒙尼德斯在一次参加宴会的过程中目睹了房顶崩塌的悲剧，凭借着头脑中存储的空间化宾客座次，他成功辨别出了被砸得血肉模糊的尸体的身份。西蒙尼德斯在不经意间使用的记忆方法被记忆术学者们总结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名为记忆宫殿法（Method of Loci）。此后，各种记忆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远至古罗马时期马库斯·法比尤斯·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的《雄辩术原理》（*Institutes of Oratory*, 95 AD），近到1991年后如火如荼举办的世界记忆锦标赛（World Memory Championships），人类一直研究、追求并崇尚着更强的记忆力。

然而，无论我们如何科学训练，除个别天赋异禀之外，大多数人能够利用记忆术实现的记忆成效依旧十分有限。特别是当人类进入赛博空间时代、数字化生活和工作场景对我们的记忆力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时，单纯依靠大脑和记忆术所能达到的记忆成效与时代对记忆力的要求之间就产生了巨大的鸿沟。

所幸的是，新技术和新设备在对我们的记忆力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为我们的记忆提供了更多存储的方式和空间。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将记忆术的本质视为“存储”，即“一种以存储和取回的一致性为目的的机械的方法”（21）。这一观点拆解了人脑与技术在记忆术问题上的藩篱，使我们意识到利用外部技术来帮助记忆与利用传统记忆术相比，并无本质区别，由此为利用外部技术来帮助记忆提供了合法性和必要性。实际上，当代人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一方面，移动硬盘、网络云盘、赛博空间等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第二大脑”，帮助我们实现了记忆的快速存储和提取，且容量在理论上可以无限大，这便是记忆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区块链、实时翻译软件、人工智能等技术和设备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记忆实践，如先存储再

¹ 参见 Anna Lisa Tota and Trever Hagen, eds.,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Memory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1-5.

识记，实时翻译记忆内容，搜索、修改、替换记忆等，这便是记忆范式的更迭。斯蒂格勒将这些人类赖以生存的外部技术称作“代具”（Prosthetique），而我们不妨将这些助力记忆的当代代具称作赛博空间时代的数字记忆术。

但数字记忆术带来的结果并不总是积极的，诚如火种和潘多拉魔盒的伴生所隐喻的一样，那些“含混的好处终究会有一日反过来对受益者不利”（Detienne and Vernant 225）¹。斯蒂格勒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第一滞留”（primary retention）和“第二滞留”（secondary retention）的基础上，他提出了“第三滞留”（tertiary retention）。三者分别对应人类记忆的三种模式。如果将三者比作对音乐的记忆，那么“第一滞留”指的是个体在当下每个音符转瞬即逝时获得的即时的、短暂的、直接的记忆；“第二滞留”指的是个体在事后借助意识和想象的力量重构出的记忆；“第三滞留”指的则是外在于人类的，对滞留记忆的物质性记录，比如日记、图书、档案等。² 显然，人类社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第三滞留”，无论是历史、知识还是文化的传播都必须依靠外部介质的存储和提取。同时，不同于胡塞尔将“第一滞留”视为纯粹的、准确的客观反应，斯蒂格勒认为三种记忆模式均包含着想象或意识的建构。何出此言呢？人脑的记忆形成机制是极其复杂的，它的形成是由各感官及文化、代际记忆、身份认同、集体无意识等各因子共同作用的产物。因故，一个西方人和东方人在听同一曲《茉莉花》的当下所形成“第一滞留”也必然会在音乐偏好和文化的过滤下产生各自的建构成分，更遑论事后被记录在外部介质上的“第三滞留”了。由此，当数字记忆术成为赛博空间时代最广泛的“第三滞留”时，这种“第三滞留”必然因数字化的诸多特性（如传输快、易修改等）而产生前所未有的想象和建构程度，并在反向影响个体的“第一滞留”和“第二滞留”的过程中散播其建构成分，从而可能导致虚假记忆的生成或众声喧哗的对立。例如，当“第三滞留”在算法、资本、娱乐产业、政治操控等加持下“信息轰炸”个体时，个体往往会陷入信息茧房或自我怀疑的困境，进而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便是数字记忆术所带来的主体性危机。难怪斯蒂格勒会高呼这个数字化的时代也是一个“系统性愚昧（systemic stupidity）的时代”（《南京课程》41）。

当然，除此之外，数字记忆术还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导致主体性危机，信息过载便是其中之一。曾经，在记忆手段有限、记忆介质不甚丰富的年代，如何保存行将消失的记忆是记忆研究者最为关切的话题之一。然而，在数字记忆术泛滥的当下，“遗忘”反而“变成了例外”和奢望（迈尔-舍恩伯格 3）。当虚拟现实中各类记忆以指数级复制、粘贴、修改、传播时，如何在信息流中

1 凡未特殊注明，引文均出自笔者拙译。

2 参见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方尔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9-20页。

高效筛选出想要的记忆并遗忘无用或无关的记忆便成为当务之急。一旦我们无法做到这点，就很可能产生记忆过载和认知负担等问题，进而导致记忆单向度化、信息化、扁平化，最终使人丧失对记忆的情感联结乃至主动建构及诠释记忆的能力。

由此可见，在赛博空间时代，各种新技术成为了新的代具并肩负起了数字记忆术的使命，前路却并不坦荡。接下来，让我们以吉布森的两部科幻小说为例，在科幻、理论和社会问题的多维关照下具体分析吉布森对相关问题的文化症候式书写。

二、《全息玫瑰碎片》中数字记忆术的情感操控

《全息玫瑰碎片》（“*Fragments of a Hologram Rose*,” 1977）是“赛博朋克小说之父”吉布森的处女作，被视作赛博朋克小说（cyberpunk fiction）先驱。小说设定在社会动荡的近未来美国，围绕帕克对自己失意人生的意识流追忆和失眠困境展开，充满赛博朋克小说典型的碎片化叙事、忧郁氛围以及“交感幻象”（consensual hallucination）（McFarlane et al. 69）。帕克的人生跌宕起伏，在历经一系列变故后，他终于在纽约安定下来，结识了女友安吉拉，并在感官体验公司谋得了一份工作。顾名思义，感官体验（Apparent Sensory Perception）即一种虚拟现实技术——当消费者头戴感官体验设备时，设备会根据插入的感官体验磁带向消费者传输电磁波，进而使其直接在大脑中再现并体验磁带中的影像。然而好景不长，安吉拉最终离开了帕克，只留下了“一根断裂的皮凉鞋鞋带、一盒感官体验磁带”和一张全息玫瑰明信片（44）¹。前半生载沉载浮的心酸和苦楚侵蚀着帕克，他逐渐患上了失眠。

为解决失眠，帕克开始用安吉拉留下的感官体验磁带来麻痹自己，以期助眠。这盘磁带借安吉拉之眼录制了其欧洲之旅。表面上，帕克每晚借此重温着前女友的游历，仿佛两人不曾分开，并在数字记忆术的仿真温柔乡中得以入眠。实际上，这一代具所提供的“第三滞留”通过数字技术的重构与放大，变得过分真切与诱人，甚至比帕克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经历更加鲜活。也就是说，感官体验设备提供的在场的、逼真的、建构的“第三滞留”，在感官上压制了帕克自身对日常生活的后视的、模糊的、具身的“第二滞留”和“第一滞留”。再辅以对前女友未尽的情愫，这种源自赛博空间的外部记忆很快便对帕克形成了情感操控并最终主导了帕克的意志——他本意借助感官体验设备来助眠，却在其“毒瘾”般的媚惑间成为了“第三滞留”延续自我的工具，在不断上瘾、重复播放的过程中陷入了更严重的失眠。换言之，原本消费者对“第三滞留”具有主导权，要购买什么、播放什么是消费者的自由；然而在赛博空间时代，当“第三滞留”凭借超越真实的

¹ 本文有关吉布森作品的引文均来自 威廉·吉布森，《全息玫瑰碎片：威廉·吉布森短篇杰作选》，李懿、梁涵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内容逐步压制“第二滞留”和“第一滞留”时，“第三滞留”便好像拥有了某种形而上层面的自主性，反客为主，令消费者沉沦到其构筑的虚拟现实中不可自拔，最终导致想要购买什么和播放什么不再取决于消费者，而是“第三滞留”——它提供什么，消费者就将耽溺于什么。

这一过程的生成逻辑和赛博空间的超真实(hyperreality)关系密切。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将没有原型的事物的摹本称作拟像(simulacra)。当一个界域由拟像所堆积和操控时，会形成超真实，即一种不依赖现实原型的、比真实更加真实的真实。¹其结果便是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言的“抽干”现实，和鲍德里亚所言的“熵增”(to total entropy)——虚拟与真实的界线消弥，人们耽溺于虚拟和形式中，不再追求现实与意义。²迪士尼乐园中虚构的角色和景观便是这样的例子。他们固然很真实，但又在现实中没有对应的所指，因而形成了一种超真实。这种超真实提供了现实无法提供的梦幻感，使人们沉迷其中，甚至逐渐认为比起现实中的美国景观，迪士尼景观更能代表美国。³据此，我们不禁会思考，帕克所沉迷的赛博空间感官体验难道不正是一种由人工智能和算法所生成的超真实吗？感官体验设备作为“第三滞留”包含着巨大的建构和想象成分——从哪个角度拍摄安吉拉的游历，怎样剪辑，应该从画面叙事上凸显怎样的情绪等，均涉及到拍摄者刻意的建构和想象。于是乎，感官体验设备重现的安吉拉虽和真实的安吉拉一模一样，却又绝非那个安吉拉，而是一种现实中无对应指涉的超真实。这个超真实的安吉拉不会发脾气、闹情绪，不会离开帕克，永远陪在身旁，对他报以微笑，展现情绪价值，充分满足了颓废的帕克的情感需求。如鲍德里亚所言，她成为了比真实更加真实的真实，让帕克自身的现实生活相形见绌，失了颜色，进而让帕克在虚实颠倒间丧失了主体性，特别是对自己生活的主导权。

当然，关于这一过程的生成逻辑还有很多其他解读。比如凯瑟琳·毕晓普(Katherine E. Bishop)就认为，这一过程的生成逻辑源于帕克与周围真实环境联系的切断及其随之而来的疏离感。⁴还有很多学者认为标题中的全息玫瑰碎片是理解这一过程的关键。全息玫瑰碎片是一张基于全息技术的明信片，在不同角度观看会看到一朵玫瑰的不同细节，却难以把握其全貌。尼尔·伊斯特布鲁克(Neil Easterbrook)认为它展现了“对永远无法重拾的完整性的痛

1 参见 Jean Baudrillard, *Simulations*, translated by Paul Foss et al., New York: Semiotext(e), 1983, 2.

2 参见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4页；Jean Baudrillard,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New York: Semiotext(e), 1983, 100.

3 参见 Jean Baudrillard, *Simulations*, translated by Paul Foss et al., New York: Semiotext(e), 1983, 25.

4 参见 Katherine E. Bishop, “The Botanical Ekphrastic and Ecological Relocation,” *Plants in Science Fiction: Speculative Vegetation*, edited by Katherine E. Bishop et al.,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20, 227.

苦乡愁”（57）。的确，作为互文，全息玫瑰碎片蕴含的碎片性、不完整性也是帕克情绪的注脚——悲惨的人生遭遇让他的情绪支离破碎、分崩离析，失去了一个具有意义感的锚点，而感官体验设备并未助力其整理情绪，而是进一步让他围困在失去安吉拉的这一碎片情绪中，难以自拔。

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复失眠之后，帕克终于意识到虚拟现实中的记忆并不能使失去的人“变得更真实”（48），也不可能让自己重拾与他人的亲密。于是他打算告别安吉拉这块已无法再被拾取的人生碎片，重新开始。然而旋即，吉布森便用最为无情且黑色幽默的笔调写道：机器发出的电波扫过了帕克的大脑。这意味着他很可能会立即陷入昏睡而忘记此刻的顿悟。这与其说是吉布森的“恶趣味”，毋宁说是技术控制论社会的底层逻辑使然。当我们为了个人便利和经济发展向技术的霸权让渡自由和隐私时，任何试图借助批判以逃离技术控制的自由也就被献祭了。因为其一、我们所有的批判本身也不得不通过技术来表达并受其监视；其二、即便能成功批判也很难逆转我们依赖科技的局面。由此，吉布森以犀利的笔触揭示了当代人过分依存数字记忆术的文化症候及其巨大风险——当我们借助这些代具来帮助记忆时，不仅我们的主体性可能遭遇风险，就连我们对这一风险进行顿悟和反思的机会也遭到了盘剥。

概而言之，《全息玫瑰碎片》向我们展现了新技术、新设备等数字记忆术在帮助人类进行记忆实践的同时，如何通过“第三滞留”的侵入，操弄人类的情感，消解人类的主体性。而在吉布森的另一篇短篇小说《根斯巴克连续体》（“The Gernsback Continuum,” 1981）中，主人公的遭遇则反映了数字记忆术如何通过“第三滞留”进行文化植入，进而动摇人类的主体性。同时，在这篇小说中，吉布森探讨了可能的应对策略。

三、《根斯巴克连续体》中数字记忆术的文化植入

《根斯巴克连续体》是吉布森在1981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故事的主角是一名摄影师“我”，“我”受雇于某出版社，负责拍摄美国各地20世纪30年代“未来主义”（futurism）风格的建筑（31）。未来主义原指肇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一场先锋艺术运动¹，但结合小说标题、故事中反复出现的根斯巴克隐射以及这些建筑的流线型风格和洗练弧度，我们可以断定，这里的风格其实特指那场先锋艺术运动的流派之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科幻小说廉价杂志时代（pulp era）所流行的根斯巴克式科幻风格。这一风格最集中的体现莫过于由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主编的杂志《惊奇故事》（*Amazing Stories*）。1926年起，弗兰克·R·保罗（Frank R. Paul）受根斯巴克之邀，为《惊奇故事》绘制了30余幅封面。从人类大战外星人到飞向宇

¹ 它主张将科技纳入美学建构的范畴，旨在讴歌现代工业文明和人类的科技进步，并“架设理论与实践的桥梁”（qtd. in Perloff 10）。

宙，从外星飞碟的阴谋到人类的反击，这些封面以杂志刊登的小说为灵感，集中表现了根斯巴克式科幻风格的特点：视觉上的流线型美学、精神上的盲目乐观主义、主题上的模式化和简单化、叙事上的娱乐色彩等。

出人意料的是，在拍摄过程中，“我”受到这些照片的影响，逐渐开始产生幻觉，幻视出一个和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充满根斯巴克式科幻风格的“或然的美国”（31）——只见流线型飞行汽车穿梭于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间、“翼状造型”的“飞行器”划破天际（32）。¹这些幻觉不断侵扰着“我”的日常生活，甚至险些令“我”遭遇交通事故。最终，“我”只能放弃这项工作。而当“我”远离工作，目睹真实生活中充满贫富差距与困顿的现实后，“我”突然从幻觉中恢复了过来。

吉布森通过设置这样“魔幻”的剧情究竟要表达什么呢？要厘清这点需要从科幻小说廉价杂志时代的时代遗产谈起。在廉价杂志时代落幕后，即便《惊奇故事》已失去了最初的影响力，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根斯巴克式科幻风格仍影响着科幻小说的创作。在很多学者和小说家看来，这种影响是消极的²，吉布森也是其中之一。他在《全息玫瑰碎片：威廉·吉布森短篇杰作选》（*Burning Chrome*, 1986）的前言中称，《根斯巴克连续体》原本是“为一部现代艺术插图史”写的“书评”（7）。尽管小说内容离书评相去甚远，但这一初衷却提醒我们应该从科幻“史”的角度观照吉布森对小说情节的设置。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指出，小说标题中的“连续体”（continuum）一词和各种带有流线型造型的幻觉其实都强调了无阻力的设计，而无阻力这一特点隐喻了科幻小说廉价杂志时代对科技的盲目乐观。³结合这些幻觉对“我”的侵扰，以及作者对这些时代错置幻觉的揶揄口吻等不难推断，吉布森借此讽刺了科幻史上盲目乐观、娱乐化严重且作品质量良莠不齐的科幻小说廉价杂志时代，及其时代遗产对后来严肃科幻文学的掣肘。难怪佩奥·阿吉雷（Peio Aguirre）和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等学者会将《根斯巴克连续体》誉为吉布森对旧式科幻小说的檄文。⁴

然而，笔者认为吉布森的目的绝非仅仅书写对旧式科幻小说的檄文，当我们从记忆的角度试图分析侵扰“我”的幻觉时，我们会发现“对旧式科幻小说的檄文”也是对数字记忆术之文化植入的檄文。1997年，吉布森在采访中说道：“我认为科幻小说在今天的最佳用处就是探索当下的现实，而不是去预测我们会走向何方”（qtd. in Brake and Hook 182）。这种忧思当下社会

1 这一幕幕仿佛根斯巴克式科幻场景的连续拼接，小说标题“根斯巴克连续体”由此而来。

2 参见 Adam Roberts, *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2nd Edition, London: The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256.

3 参见 Andrew Ross, “Getting Out of the Gernsback Continuum,” *Critical Inquiry* 2 (1991): 429-431.

4 参见 Peio Aguirre, “Semiotic Ghosts: Science Fiction and Historicism,” *Afterall: A Journal of Art, Context and Enquiry* 28 (2011): 125; Bruce Sterling, *Mirrorshades: The Cyberpunk Anthology*, New York: Ace Books, 1988, 1.

问题的动机赋予了吉布森的写作以浓厚的人文关怀气质，他的作品中充满光怪陆离的隐喻，而正是这些隐喻在未来与现实间搭建了桥梁，以供读者穿过未来的烟霞窥见吉布森所要反思的当下社会文化症候。如果说《全息玫瑰碎片》中难以窥见全貌的全息明信片作为隐喻，指涉了当代社会对数字记忆术的盲从所带来的情感疏离，那么《根斯巴克连续体》中那些好似具有“魔法”的照片则像是将赛博空间中的虚拟现实召唤至现实世界的数字化代具，隐喻了当代泛滥的数字影像技术等数字记忆术对过往文化的招魂。如此一来，那些根斯巴克式科幻风格幻觉的出现原因便不再神秘，而拥有了合理的解释——这些幻觉正隐喻着数字记忆术的“第三滞留”对“我”记忆的侵扰。正如“我”的好友基恩所言，它们就像 30 年代科幻文化作为“符号幽灵”在当下的回归。

由此可见，吉布森借幻觉所讽刺的不仅是旧式廉价杂志小说对严肃科幻文学的掣肘，也是旧式文化借数字记忆术在当下的植入与复魅。当数字代具突破了传统的文字范式，型塑绘声绘色的虚拟现实时，旧式文化也就不再停留在“不在场”的怀旧领域，而充满了基于“遥现”（telepresence）的“在场”感（Gattiker 12）。由此，人们很容易将这些记忆中包蕴的过去文化错误体认作当下文化，将失落文化错误体认作鲜活文化，从而为自己编织一个来自过去文化的囚笼。“我”的遭遇向读者生动展现了数字记忆术植入文化的可能，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困顿的严重性。试想，当数字记忆术带来的不仅是文化记忆的存续，还让其中一些文化侵扰人们，使人们无法忘却或摆脱它时，人类该如何反思过往的消极文化？人类文化又该如何推陈出新呢？

所幸在小说末尾，“我”通过远离拍摄工作并体察人间百态的参差，成功摆脱了数字记忆术所植入的文化幻觉。这一剧情安排可视作吉布森对解决之道的探索，其背后的应对逻辑和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的“诸众”（multitude）理论异曲同工。诸众这一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中历史悠久，尽管不同学者对其有不同的阐释，但这些阐释均强调了对同一性的反叛和差异性的崇尚。例如，霍布斯指出，诸众是与人民相对的概念，人民这一实体有着“单一的意志”（126），而诸众则有着复杂多样的意志；斯宾诺莎则指出，人民是一种“直接向心的联合”（29），诸众则是非直接、非向心的差异性的联合。维尔诺在此基础上将诸众纳入文化领域，认为诸众作为一种新的集体概念，通过将个体视角纳入集体概念合法性的建构中，有利于破除以往人民等集体概念对个体差异化的个性、才能、潜力的压迫和暴政。实际上，随着技术的发展，集体对个体在文化上的压迫屡见不鲜。比如张宸晟指出，随着数字记忆术的发展，资产阶级通过垄断代具进一步实现了记忆、知识、文化、情感等“非物质领域劳动财富的垄断和分配”（49），并通过数字记忆术的传播造成了个体意识的共识化。加之大众为了生存将所有时间用于劳动上而失去了展现个性的机会，由此，大众便成为了斯蒂格勒笔下彻底失去了任何象征的存在。换言之，一如《根斯巴克连续体》中的“我”一般陷入了被代具

定制好的文化囚笼。诸众的概念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那就是通过重构集体概念，强调差异的个体的联合而非整齐划一的同一的声部，以打破同一性文化对个体施与的枷锁，从而解放个体的个性、积极性和潜能。在小说最后，“我”通过新闻接触到了石油危机和核能风险等新闻，这些新闻就像差异性的窗口，让“我”看到了同一性的、岁月静好的未来主义幻觉之下还存在这么多庞大的、不同的、遭受着苦难的群体，于是“我”终于冲破了数字记忆术的文化囚笼。

《全息玫瑰碎片》中希冀安吉拉记忆的永存让帕克被技术操控情感；《根斯巴克连续体》中沉醉旧日幻梦让“我”被技术文化植入。无论是希冀记忆永存，还是沉醉旧日幻梦皆是对虚假的、不变的、同社会现实不符的同一性的执念。而帕克的顿悟和“我”的清醒无不在告诉我们，要接受记忆的流逝和碎片化以及个体的差异性，任何强制留住同一性记忆的实践都可能伴随巨大的代价。所以，不要过分依赖数字记忆术，接受记忆的流逝并坚持个体的差异性才是赛博空间时代记忆实践的应有之义。

回到爱比米修斯隐喻，如果将这则神话故事视作具有启示录意义的元叙事，那么它无疑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对天火（技术）不可避免的“期待”（Elpis）。而伴随天火而来的还有潘多拉魔盒，故而这份期待之中也包含着对自我毁灭的隐忧——“人类不得不日复一日地劳作、操作器具，直至忧染双鬓”（斯蒂格勒，《过失》 209）。同理，在赛博空间时代，当数字记忆术为人类的记忆实践开辟了无穷无尽的“第三滞留”空间和范式时，人类作为个体的记忆也就必然受到无所不在的“第三滞留”的影响和挑战。吉布森通过文学的形式，探讨了数字记忆术消解人类主体性的两种路径以及人类的反抗方式。如果将《全息玫瑰碎片》比作吉布森对反抗失败原因的思辨，那么《根斯巴克连续体》则是吉布森对反抗成功情形的构境。他将自身的赛博美学、时代的技术哲学困境和忧思人类命运的情感相糅合，咀嚼成光怪陆离但苍劲厚重的叙事。从这个意义上讲，两部作品不仅是科幻小说，也是吉布森写给赛博空间时代的警世箴言。

Works Cited

- Aguirre, Peio. "Semiotic Ghosts: Science Fiction and Historicism." *Afterall: A Journal of Art, Context and Enquiry* 28 (2011): 124-134.
-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 [Assmann, Aleida. *Cultural Memory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Functions, Media, Archives*, translated by Pan Lu. Beijing: Peking UP, 2016.]
- Baudrillard, Jean.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New York: Semiotext(e), 1983.
- . *Simulations*, translated by Paul Foss et al. New York: Semiotext(e), 1983.

- Bishop, Katherine E. "The Botanical Ekphrastic and Ecological Relocation." *Plants in Science Fiction: Speculative Vegetation*, edited by Katherine E. Bishop et al. Cardiff: U of Wales P, 2020. 214-232.
- Brake, Mark L. and Neil Hook. *Different Engines: How Science Drives Fiction and Fiction Drives Science*. London: Macmillan, 2008.
- Detienne, Marcel and Jean-Pierre Vernant. *The Cuisine of Sacrifice among the Greeks*.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89.
- Easterbrook, Neil. "Recognizing Patterns: Gibson's Hermeneutics from the Bridge Trilogy to Pattern Recognition." *Beyond Cyberpunk: New Critic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Graham J. Murphy and Sherry Vint.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46-64.
- Gattiker, Urs E. *The Internet as a Diverse Community: Cultural, Organizational, and Political Issues*. London: Taylor & Francis, 2009.
- 威廉·吉布森：《全息玫瑰碎片：威廉·吉布森短篇杰作选》，李懿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年。
- [Gibson, William. *Burning Chrome*, translated by Li Yi et al. Beijing: New Star Press, 2014.]
- 霍布斯：《论公民》，应星、冯克利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
- [Hobbes, Thomas. *On the Citizen*, translated by Ying Xing and Feng Keli. Guiyang: 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弗雷德里克·詹姆明：《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 [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and Theories of Culture*, translated by Tang Xiaobing. Beijing: Peking UP, 2005.]
-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袁杰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
- [Mayer-Schönberger, Viktor. *Delete: The Virtue of Forgetting in the Digital Age*, translated by Yuan Jie.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 McFarlane, Anna et al., eds. *Fifty Key Figures in Cyberpunk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 聂珍钊：“文学跨学科发展——论科技与人文学术研究的革命”，《外国文学研究》2（2021）：31-43。
- [Nie Zhenzhao. "The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The Revolu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cademic Research in Humanitie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31-43.]
- Perloff, Marjorie. "The Audacity of Hope: The Foundational Futurist Manifestos." *The History of Futurism: The Precursors, Protagonists, and Legacies*, edited by Geert Buelens et al.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12. 9-32.
- Ross, Andrew. "Getting out of the Gernsback Continuum." *Critical Inquiry* 2 (1991): 411-433.
- 斯宾诺莎：《政治论》，冯炳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 [Spinoza, Baruch de. *Political Treatise*, translated by Feng Bingku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9.]
- Sterling, Bruce. *Mirrorshades: The Cyberpunk Anthology*. New York: Ace Books, 1988.
- 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

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Stiegler, Bernard. *Nanjing Course: Reading Marx and Engels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From German Ideology to the Dialectics of Nature*, translated by Zhang Fugong. Nanjing: Nanjing UP, 2019.]

——：《技术与时间 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

[—.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translated by Pei Che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12.]

——：《技术与时间 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方尔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

[—. *Technics and Time 3: Cinematic Time and the Question of Malaise*, translated by Fang Erpi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12.]

Tota, Anna Lisa and Trever Hagen, eds.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Memory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张宸晟：“数字记忆术、个体化危机以及可能的出路——基于维尔诺‘诸众的集体’重思斯蒂格勒个体化危机理论”，《理论界》9（2024）：44-50。

[Zhang Chensheng. “Digital Mnemonic, Individuation Crisis, and Possible Way Out—Rethinking Stigler’s Theory of Crisis of Individuation Proces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Virno’s ‘Collective of Multitudes’.” *Theory Horizon* 9 (2024): 44-50.]

张一兵：“义肢性工具模板和符码记忆中的先行时间——对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的解读”，《社会科学辑刊》6（2017）：60-65。

[Zhang Yibing: “Precedence Time in Prosthetic Tool Templates and Symbol Memory: An Interpretation of Stiegler’s *Technics and Tim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6 (2017): 60-65.]